

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
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

电影往事

下

Dianying

Wangshi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

/ 口述上海 /

电影往事

下

Dianying Wangshi

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
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电影往事 /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. —上海:上海
教育出版社, 2008. 12

(口述上海)

ISBN 978-7-5444-2029-7

I. 电... II. 上... III. 电影史—上海市 IV. J9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6386 号

口述上海

电影往事

上、下册

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

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44.5 插页 6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 本

ISBN 978-7-5444-2029-7/K·0016 定价:98.00 元(上、下册)

(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口述上海编委会

主 任：俞克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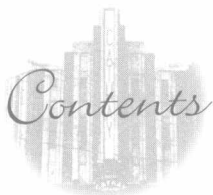
副主任：顾 明 徐建刚(常务)

成 员：曹力奋 严爱云 吴祥华
袁志平 徐国梁 徐沪林

电影往事

主 编：唐旻红

副主编：王 岚 宋晓东



目 录

戏曲片

- 袁雪芬：**对这两部电影作品，我都有很不满意的地方 3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、梅 梅
- 王文娟：**越剧“林妹妹”的尘世风雨 21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邵滨孙：**《罗汉钱》和《星星之火》，让我从舞台跨入银幕 39
采访：金雪苓、褚伯承、唐旻红 整理：褚伯承
- 蓝 流、杨观复：**为名导当助理，历沪剧变影戏 53
采访：徐建刚、金雪苓、褚伯承、唐旻红 整理：褚伯承
- 孙逸民：**剧院改革使沪剧频出精品、走上银幕 69
采访：徐建刚、金雪苓、褚伯承、唐旻红 整理：褚伯承
- 张 清、沈仁伟：**《星星之火》中有一群最生动最感人的工农兵形象 87
采访：徐建刚、金雪苓、褚伯承、唐旻红 整理：褚伯承





美术片

- 段孝萱：**摄影天地 水墨人生 101
采访整理：宋晓东
- 严定宪：**猴王初问世 117
采访整理：宋晓东
- 曲建方：**走向世界的“阿凡提” 135
采访整理：宋晓东
- 张淙源：**我离不开心爱的动画事业 147
采访整理：宋晓东

科教片

- 刘 咏：**中国科教片的三次高潮和两次弯路 161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羽 奇：**科教片可以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，它不是没有市场 173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杜生华：**科教片的兴衰和走向跟社会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 186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、舟 舟



纪录片

- 黄宝妹：**从纺织劳模到艺术性纪录片主角 201
采访整理：倪超英、唐旻红
- 羽 奇：**为世界纪录片之父伊文思协拍《愚公移山》 215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
译制片

- 苏 秀：**最喜欢的作品没有公映，真的是很遗憾 231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梁沈修：**苏联电影在中国的跌宕命运 249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曹 雷：**他们说，第一扇给他们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户是译制片 267
采访：许春辉、唐旻红 整理：许春辉
- 乔 臻：**唯有译制厂始终都有业务，大家很羡慕 288
采访：唐旻红、郭 炜 整理：郭 炜
- 李国庆：**中国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热及《佐罗》热 304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
- 童自荣：**我一生从事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份工作 314
采访：许春辉、唐旻红 整理：许春辉

后记

331



戏曲片





袁雪芬

袁雪芬，1922年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，1933年入科班学戏，1936年随科班到上海，并参加灌制了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，与筱丹桂、傅全香等人合称“越剧十姐妹”，并被誉为越剧“新后”。1942年起，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进行越剧改革，同时开始大量上演新戏。其中根据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改编的越剧《祥林嫂》被称为“新越剧的里程碑”，并被两度搬上银幕。1952年，由其主创主演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出演，并被拍成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，获文化部颁发的“1949~1955 优秀影片奖”荣誉奖。曾任上海越剧院院长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任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、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。曾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“金唱片奖”，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——“表演艺术成就奖”和首次设立的“白玉兰”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奖项。编著有《越剧舞台美术》画册、《袁雪芬自述》、《袁雪芬的艺术道路》、《袁雪芬》、《袁雪芬唱腔选集》等书籍和专业学术文章数百篇。



袁雪芬：对这两部电影作品， 我都有很不满意的地方



口述：袁雪芬

采访整理：唐旻红、梅 梅

时间：2007年4月24日，7月17日

地点：袁雪芬上海寓所

袁老师，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请您谈谈解放后您创作主演的越剧电影。我们先从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开始吧。您最初接触这部戏是什么时候？

《梁祝》这出戏，从越剧诞生的初期就有了。而我，从刚开始学习越剧的时候就开始演了。我1922年出生，11岁进的科班，一开始学戏，就是学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它是经过了几代人下来，传到我们手里的。我是属于后辈之人了。但是当我学唱这出戏时，它的糟粕很多，荒诞、色情、迷信、因果，样样都有。这也是受了当时越剧演员文化水平的限制。可以说，那时唱越剧的根本都没什么文化。当然，戏里面基本的故事情节，主人公对爱情的专一，这还是很感人的。我们科班在抗战前就到了上海。记得我16



岁时，就随科班四季春班^①到上海“大来剧场”演出了，我演祝英台，唱小生的马樟花^②演梁山伯，她当时17岁。当时我们觉得有些唱词实在唱不出口，就改掉了。但是整部戏里还是有许多糟粕。一直到解放以后，《梁祝》才改得比较健康。

你们将这个题材的传统版本进行改编，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剧本，是叫《梁祝哀史》吧？后来怎么会改成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这样一个比较直白的剧名的？

其实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这个剧名从一开始就有了，是它完整的剧名。因为当年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已经传到中国了，大家都接受的，用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的剧名就有点不约而同了。当时我们的舞台剧，这两个名字都用的，后来《梁祝哀史》用得比较多。拍电影的时候，大家商量后，还是恢复了原来完整的名字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

怎么会选择它来拍电影？而且是第一部彩色影片？

1950年我参加了国家剧团^③，1952年我们剧团就参加建国后第一次戏曲会演^④。我们带去了《梁祝》和《白蛇传》两部戏。当时的《梁祝》是范瑞娟演梁山伯、傅全香演祝英台。剧本基本上是由编剧徐进^⑤根据我和范瑞娟在舞台上演出的情况记录下来的。然后将这个修改过的剧本给傅全香演。我则新排主演了《白蛇传》。当时汇演的戏曲剧目中，还有一台川剧叫《柳荫记》，也是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是经过士大夫加工的，文本跟我们

① 绍兴女子文戏科班、戏班。创建于1933年6月，原名四结村。班址在嵊县柳岸村兴福庵。由王天喜、任友村、邢雪富和袁茂松4人为主合股经营，班主王天喜。

② 马樟花(1921~1942)，越剧小生。拿手戏有《梁祝哀史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玉蜻蜓》等，有《仕林祭塔》、《珍珠塔》2张唱片传世。

③ 上海戏曲界第一个国营剧团——华东越剧实验剧团，袁雪芬任团长。

④ 全称为“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”。

⑤ 徐进(1923~)，剧作家。曾任上海越剧院编剧、副院长。代表作为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红楼梦》和电影剧作《舞台姐妹》等。



的越剧不一样。我们的文本是民间文学性的。相对来说，观众对我们的越剧版本更认可一些。1952年这一汇演，效果很好，毛主席就批示下来了，要把它拍成彩色电影。于是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影。

第一次拍彩色电影，困难很大吧？

是啊！首先是信心问题，我们能不能拍成功彩色片。当时就有苏联专家说，你们能将黑白电影拍好就不错了，现在拍彩色电影，你们还没那个能力，再过三五个五年计划后才能拍。确实，拍彩色电影所需的胶片洗印技术和灯光都不一样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苏联的专家也不帮忙。上海电影厂的万氏兄弟就自告奋勇要试拍彩色片，因为他们已经不声不响地在研究试验彩色配方了，听到我们的电影要拍彩色片，那是兴奋得不得了。他们从旧社会走过来，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，一直致力于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，对我们国家拍出自己的彩色电影，那是非常非常期待的。他们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，就是中国人自己要争气，要研究出彩色片的洗印药水。

就是拍《大闹天宫》的万籁鸣、万古籁兄弟吧！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中国动画片之父，却不知他们对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倾注了这么多热情和心血。

是的。他们就象科学家做试验一样，一遍遍地拍，一遍遍地试，用各种配方，看哪个效果最好，真是花了很多心血啊！我们决定要拍彩色片了，首先当然还是要研究苏联的技术，但是没有技术资料，更没有人教，只能自己试，完全靠自己研究。我是完全支持他们的，我觉得创业总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，尽管一遍遍地拍对我们来说很辛苦，但我们都坚持一定要把这个彩色片拍成功。终于有一天，彩色片洗出来了。看到我们自己也有彩色片了，我们很是高兴。可是第二次再去看就不对了，影像不是偏红就是偏绿，不稳定。因为它需要有整套的药方啊，这就要研究，关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另外，彩色电影的拍摄对灯光的亮度要求也很高，一般的钨丝灯不够，而要用特制的炭精灯，俗称阿克灯。但是，我们在拍片过程中，那个炭精灯老是“眨眼睛”（指灯光不停闪烁）。



等它稳定下来了，炭精却没了。

上影厂的那位厂长就畏难了。夏衍^①来厂里看电影的拍摄情况，他就汇报说无法拍彩色片。结果，就准备还是拍黑白片。我们真是很不甘心啊！拍黑白片了，那么原来拍彩色电影的那些布景就要全部换掉。就在全场拆换布景设备时，一个电工在旁边对着阿克灯自说自话地说：你们这两个阿克灯啊，要用你们时，你们不停地“眨眼睛”，现在不用你们了，你们倒不“眨眼睛”了。这些话刚巧被我听到，问他为什么。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。一研究，原来以前用时，一直都把炭精装倒了，所以才会出现“眨眼睛”的问题。这个灯的说明书是俄文的，电工看不懂。其实当初完全可以请一个翻译的，上海懂俄文的人多的是啊。那位厂长啊，缺乏创业精神，加上官僚主义，没有创新思维。

问题弄清楚了，就能拍彩色片了。你们一定很高兴。

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让他们拆布景的赶快停，马上就打电话给夏衍，请他来看我们拍的彩色片。他来了，从镜头里看，就说很好看了。我们的彩色电影背景，既不是实景，也不是舞台式的布景，而是画的山水布景，不完全写实，同时又运用了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，具有国画的意境，来衬托我们这个戏，很美的，而且我觉得也是一种创造。接着，夏衍就召集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，大家一致要求拍彩色片，包括我们演员、导演和工人等。夏衍说既然炭精的关键问题解决了，大家都想要拍彩色片，现在的情况是又可以拍了，那为什么不拍呢？于是，又重新开拍彩色片。不过正式开拍后困难还是很多的。拍彩色电影需要一整套的相关设备。这个条件我们不具备，完全要自己摸索，拍摄或洗印时都出问题了，有些好的镜头没有留下来，有的镜头甚至要拍二三十遍。我记得有一个镜头，我看了后自己比较满意的：祝英

① 夏衍(1900~1995)，作家、剧作家、电影理论家。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。





台被父亲强行配给马文才后，正好梁山伯到了，这一刹那，她要看一眼梁山伯，很久不见了么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婚配，又非常痛苦，眼泪汪汪的那个镜头。这个镜头拍得很好，却洗坏了。后来又拍了二三十遍，就是因为洗印效果不稳定。经过反复摸索，最后找到了稳定的方法。万氏兄弟确实是很负责任的。我也跟夏衍部长汇报这个情况，请他多鼓励鼓励他们。但是为了这个彩色片我们也是付了代价的。二三十遍拍下来，拍到后来我的情绪都没有了。演戏是要有真感情的，你晓得吗？人不是机器呀。像刚才说的那个镜头，最后效果不好，我很不满意！

大家都非常肯定这部电影，观众也是好评如潮，您自己却用这样严厉的口吻批评自己的表演。

这是事实么！舞台上很多好的戏也没有保留下来，我对自己的有些表演也不满意。而且拍摄时，因为我们只有两只炭精灯，还要打许多钨丝灯，热得很啊，加上天又热，都是四十多度，戏服里都是汗啊，而且炭精灯的灰



1953年诞生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——越剧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

漫天飞，都落到眼睛里，眼睛都肿着，我是掉磅掉了20斤，且得了十二指肠溃疡。这些都影响到了表演的质量。从舞台到电影真是不习惯呀，情绪也不连贯，不像舞台上，一出戏，一幕幕下来，情绪是非常连贯真实的。拍电影就不一样，一个个镜头、一场场戏是分开的，断断续续，还时常重复，对表演、对感情



的酝酿很有影响，就不太真实了。不过总算是拍出来了。

为了拍好这部电影，当时的陈毅市长还给过你们特别的支持。

那个阶段，正赶上国民党轰炸我们的发电厂，电压很不稳定。于是我们就向陈毅市长借探照灯的发电机，是一组的。他同意了，白天借过来给我们拍电影，晚上再归还给部队。所以对陈毅市长，我们是很感激的。

电影拍好后，还没有公映，就专门请陈毅市长先来看。当时看完电影，厂长向市长汇报说，为拍这部彩色片，花了40来万，如果拍黑白的，只要20来万就可以了。陈毅说：今年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，就拍出了这样一部彩色片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我不问你花了多少钱，我要问你你是怎么拍出来的，不是没条件吗？苏联专家不是把我们判了死刑了吗？不希望我们动了吗？那我们不是还是拍出来了吗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，苏联专家能给我们蓝图吗？我们要有自己的飞机大炮等等，还不是要依靠我们自己？如果我们不敢动的话，那就不会有这部电影了。这样的经验，不是40万块钱能够买来的。要好好总结这个经验。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。当时听了陈毅市长的这番话，我们都是非常高兴，非常欣慰的。

1955年，周恩来总理又把这部电影带到日内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放映，引起轰动，被誉为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外国人用莎士比亚的这样一部名剧来比照我们的“梁祝”，蛮有意思的。

这个说法不是外国人想出来的，是我们的周总理提的。电影还未公映，周总理就到上影来看我们这部电影了，看了之后就将它带到了日内瓦。那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。那时候，新中国有大量的工农兵电影，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中国不要文化的。但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给国际社会带去了中国的另一种面貌。当时，周总理跟翻译说，只要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大家就都能理解了。

这些情况你们当时知道吗？





我们是通过新闻报道和日内瓦过来的电报了解到这些情况的。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，邓颖超大姐就过来祝贺我。后来周总理回国后，开会碰到我，也来祝贺我，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，他请外国朋友喝的是茅台、看的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大家热烈谈论的也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大量的外电报道这部电影，我们用事实证明了，中国共产党是要文化的。

后来这部电影又被拿到香港放映，也是非常轰动。它在内地和香港都创造了票房纪录。

是的。香港那边，看了这部电影呀，许多解放前出去的人又纷纷地想回来了。因为这部电影，他们对共产党、对新中国的感受，从恐惧到接受，尤其是工商界人士，回来的特别多。我们这部片子不仅在香港出了风头，可以说，在政治上也打了一个胜仗，起到了动员人们回大陆的作用。当时香港的朋友寄来一大批有关这部电影的报道。这部片子在上海的上座率是超纪录的，在香港也是超纪录的，非常之火爆。许多台湾、澳门人都特地跑到香港看这部电影。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影迷、戏迷写信来表达他们对这部电影的喜爱，其中有很多人从没看过越剧，因为这部电影，从此成为了忠实的越剧观众。

因为电影的作用，越剧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力也大大提升了。之后你们到海外巡演的机会也多起来了把？

1960年，我们越剧院就到香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公演，带去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碧玉簪》、《西厢记》和《打金枝》等一台折子戏，也是盛况空前。许许多多的观众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东南亚和台湾等地赶过来，很多民族资本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饭。有一位资本家看了戏，接待了来自大陆的同胞后，激起了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激动地说，我死了以后，骨灰一定要埋在祖国，祖国有那么好的文化。这一趟公演，可以说是带回了許多越剧爱好者啊！

那么国外呢？有没有去公演过？

